

#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 ——基于 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鲍莹莹

**摘要：**在市场力量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隔代照料和代际赡养已经成为现代家庭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利用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组结果显示，其一，隔代照料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略低于城市户籍祖辈；其二，隔代照料对 55 岁及以上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边际效应呈阶梯型增长趋势，但对 55 岁以下祖辈的影响不显著；其三，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大于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

**关键词：**隔代照料 代际赡养预期 代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子女需要赡养父母，这种“反哺式”的赡养模式一直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在市场力量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父母向子女提供帮助的“逆反哺”现象也日渐增多，并表现在住房提供、家务照料和隔代照料等方面（许琪，2017；怀默霆，2001）。尤其在隔代照料上，中国祖辈父母参与照料孙辈的比重越来越高，一项调查显示：在韩国，祖辈参与隔代照料的比例为 6%，而中国高达 58%（Ko and Hank, 2014）。

中国的隔代照料现象为何如此普遍？一方面，由于受到“含饴弄孙”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祖辈父母会主动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另一方面，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但市场化托幼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因而只能依靠父母来照料孩子（周晶等，2017）。针对此种现象，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进行了阐释：与西方社会的“代际接力”模式不同，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反馈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来往取予始终遵循着“均衡互惠”的原则，即父母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以换取子女的晚年赡养支持（费孝通，1983）。

事实上，在这种家庭代际互动模式中，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的同时，子女也为父母提供了晚年保障和精神慰藉（杨菊华，2018）。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①育儿成本上涨增加

了“生育一代”的生活成本，父母提供隔代照料服务，能够极大缓解子女的经济负担（卢洪友等，2017；Kanji，2018）；②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就业和收入具有挤出效应，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父母必然会将养老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何圆、王伊攀，2015；Rupert and Zanella，2018）。鉴于此，本文探讨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特征，促进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的来源及变量的定义；第四部分实证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第五部分探讨隔代照料对不同群体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 二、文献综述与评述

目前，学界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照料—赡养”关系进行解释，主要包括文化规范解释范式、现代化解释范式和代际交换理论。具体而言：

第一，传统文化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与其它形式的社会交换不同，家庭内的代际交换行为强烈地受到利他主义情感的支配（贝克尔，1987）。与此同时，Logan et al. (1998) 研究发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互动，也涉及到情感、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等因素，而隔代照料与子女赡养正是传统观念中“父慈子爱、代际和谐”的具体表现。父母为子女提供帮助不仅能够减少晚年的失落感，而且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支持（张新梅，1999；孙鹃娟、张航空，201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责任内化”的角度对中国代际赡养模式进行阐释。刘汶蓉（2012）认为，传统的“孝道”观念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规范和影响着子女的赡养行为。在这样的代际关系中，子女不孝等同于“大逆不道”，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会失去亲友的支持，难以在熟人社会中立足（许琪，2017）。由此可见，对孝道伦理的高度推崇，以及强有力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已经成为确保中国子女赡养父母的关键因素（Whyte，2004）。

第二，现代化解释范式认为，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共同侵蚀着传统的赡养模式。Goode (1963) 指出，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正从传统的“血亲家族制”向现代的“夫妻家庭制”转变，夫妻双方会最大限度地遵循“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代际关系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与此同时，市场意识和现代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导致长者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Whyte，198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父母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子女也会拒绝或有条件地承担赡养义务，在他们看来，赡养父母早已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狄金华、郑丹丹，2016）。

第三，代际交换理论将子女赡养行为看成是“付出一回报”式的代际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出于经济利益，还是情感需要，资源的代际流动和重新配置都表现为一种经济上、劳务上或者精神上的双向支持与互换（吴小英，2008）。沿着这一逻辑，可以将隔代照料与子女赡养看成是计算过“成本—收益”后的理性决策行为（熊跃根，1998）。在这一过程中，父母会通过各种途径为子女提供帮助，并与子女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以增加当下及未来的赡养支持，而子女的赡养行为也部分源自于父辈

的早期支持（陈皆明，1998）。这种基于互惠原则而形成的隐形社会契约，已经成为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Silverstein et al., 1998）。

以上三种解释范式对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照料—赡养”关系给出了合理解释，但也存在不足，①文化规范解释范式常常将“文化传统”看成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决定因素，一旦涉及到家庭义务时，不同规范往往产生冲突，难以自洽；②现代化理论则将家庭代际关系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下，无法对隔代照料与子女赡养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③虽然代际交换理论兼具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与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但尚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基于此，本文以代际交换理论为基础（见图1），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探讨隔代照料对城乡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并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②分析隔代照料对不同年龄、不同居住安排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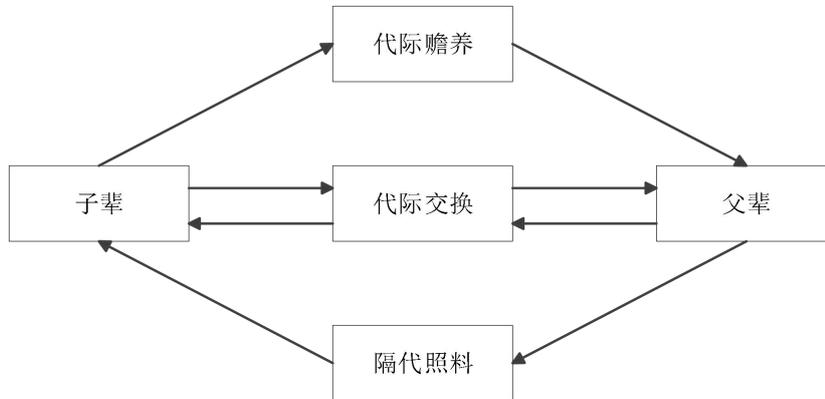


图1 隔代照料影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分析框架

###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5年主持实施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该数据分别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三轮追踪调查。调查地点涉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养老意愿、经济状况、子女支持和家庭互助等方面。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剔除。首先，选择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作为样本；其次，剔除没有孙辈的样本；再次，剔除隔代照料时间无效的样本；第四，为了避免异常值可能产生的估计偏差，剔除年龄在90岁以上、子女数超过15个和孙子女数超过20个的样本；最后，进一步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错填以及不符合条件的样本，最终得到8657个有效样本。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代际赡养预期预期	0.65	0.48	0	1	8657
是否照料	0.53	0.50	0	1	8657
照料时间	22.23	31.21	0	260	8657
男性	0.48	0.50	0	1	8657
有配偶	0.87	0.33	0	1	8657
与子女关系好	0.96	0.19	0	1	8657
家庭人均收入	4.10	4.14	0	14.23	8657
年龄	62.73	8.56	45	90	8657
自评健康好	0.20	0.40	0	1	8657
认知能力	3.11	1.82	0	10	8657
健在子女数	2.94	1.36	1	15	8657
孙子女数	4.30	3.12	1	20	8657
16岁以下孙子女数	2.58	1.89	0	14	8657

##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为了检验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text{Probit}(E_i = 1) = G(\alpha_0 + \alpha_1 C_i + \alpha_r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因变量。 $E_i$ 表示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借鉴张川川等(2017)的做法,本文用问卷中“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您认为生活来源将主要是什么?”来测量受访者的未来养老预期。该问题的选项包括“子女、储蓄、养老金或退休金、商业养老保险和其他”。本文将回答“子女”的赋值为1,回答其它选项的赋值为0。统计结果显示,有65.33%的受访者预期依靠子女养老。

2.自变量。 $C_i$ 表示隔代照料,包括“是否照料”和“照料时间”两个变量。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周晶等,2016;吴培材,2018),“是否照料”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配偶是否照顾孙子女”来测量,将回答“是”的赋值为1,回答为“否”的赋值为0;“照料时间”用问卷中“过去一年大约花几周时间来照看这个子女的孩子”来测量。由于部分受访者同时照顾多个孙辈,总照料时间可能会大于52周。统计结果显示,53.41%的受访者有过隔代照料经历,其平均照料时间为22.23周。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 $X_i$ 包括:①人口学特征。有研究表明,性别、婚姻、年龄等因素会影响到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陆杰华、张莉,2018)。本文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有配偶的赋值为1,无配偶的赋值为0;年龄变量以调查年份减去个人的出生年份得到,取值介于45~90岁之间。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男性占47.58%,有配偶的占87.25%,平均年龄为62.73岁。②收入水平。本文用家庭人均年收入来测量,该指标由工资收入、农业收入、自雇收入、政府转移收入以及社会捐赠收入等相加后,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得到,并进行对数化处理。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5209.61元。③子女养老供给状况。该指标包括“子女数量”和“与子女关系”两个方面。

子女数量用“您有多少个健在子女”来衡量，表示代际赡养的供给数量；与子女关系用“您对您和子女关系满意吗”来衡量，表示代际赡养的供给质量。将回答“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的赋值为1，表示与子女关系好；回答“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的赋值为0，表示与子女关系不好。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平均子女数为2.94个，与子女关系融洽的占96.11%。④健康状况。本文以前后两次自评健康的平均得分来衡量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将自评健康小于3的赋值为1，表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将自评健康大于或等于3的赋值为0，表示健康状况不好。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健康状况好的占20.01%。⑤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可以衡量个体的健康状况、生存能力以及个体对未来的判断力。本文用“十词记忆数量”来衡量受访者的认知能力，答出一词加1分，答不出得0分。由于词语记忆分为瞬时记忆和延时记忆，本文用瞬时记忆与延时记忆的平均得分来衡量认知能力（Nishimura et al., 2018）。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认知能力的平均得分为3.11分，两次平均记忆单词数约为6个。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基本结果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为了进一步研究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影响的城乡差异，本文将受访者划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回归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是否照料”和“照料时间”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变量后，有隔代照料经历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要高于那些没有隔代照料经历的祖辈；照料时间越长，祖辈预期依靠子女赡养的概率越高。分城乡来看，隔代照料对城镇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村祖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孝道”、“反哺”等观念开始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出现分化。城镇地区以核心家庭为主，思想观念开放，养老模式选择更加多样化；农村地区以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为主，传统“代际赡养”观念依然根深蒂固。②城镇人口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退休后能够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不必依靠子女养老；农村地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收入不高，且不稳定，老人更倾向于依靠子女养老。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认知能力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负向影响。年龄越大、认知能力越强，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就越低；男性预期依靠子女赡养的概率低于女性；有配偶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要低于无配偶的祖辈。与子女关系和健在子女数量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与子女关系越好，健在子女数越多的祖辈，其代际赡养预期越高。自评健康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认为其对城市户籍祖辈具有正向影响。

表2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是否照料	0.055*** (0.010)	0.031 (0.021)	0.064*** (0.011)	—	—	—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照料时间	——	——	——	0.001***	0.0003	0.001***
				(0.0002)	(0.0003)	(0.0002)
家庭人均收入	0.0001	0.004	-0.0008	0.00004	0.004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与子女关系好	0.207***	0.114*	0.211***	0.206***	0.116*	0.210***
	(0.025)	(0.064)	(0.024)	(0.025)	(0.064)	(0.024)
健在子女数	0.068***	0.068***	0.033***	0.066***	0.067***	0.031***
	(0.005)	(0.008)	(0.005)	(0.005)	(0.008)	(0.005)
认知能力	-0.033***	-0.044***	-0.005*	-0.033***	-0.043***	-0.005
	(0.003)	(0.006)	(0.003)	(0.003)	(0.006)	(0.003)
男性	-0.046**	-0.062***	-0.035***	-0.045**	-0.061***	-0.034***
	(0.010)	(0.021)	(0.010)	(0.010)	(0.021)	(0.010)
年龄	-0.011***	-0.015***	-0.002***	-0.011***	-0.015***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有配偶	-0.087***	-0.134***	-0.065***	-0.085***	-0.132***	-0.063***
	(0.016)	(0.030)	(0.017)	(0.016)	(0.030)	(0.017)
自评健康好	-0.033***	0.042*	-0.042***	-0.032***	0.042*	-0.041***
	(0.012)	(0.023)	(0.013)	(0.012)	(0.023)	(0.013)
常数	1.677***	2.803***	0.359*	1.719***	2.882***	0.405**
	(0.165)	(0.505)	(0.186)	(0.163)	(0.497)	(0.184)
观测值	8657	1494	7163	8657	1494	7163
伪R <sup>2</sup>	0.053	0.135	0.025	0.054	0.134	0.027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 (二) 模型的内生性检验

上述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一般来说,可能产生内生性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否照料”和“照料时间”是指受访者前一年的隔代照料行为,而被解释变量“代际赡养预期”衡量的是当下对未来的预期。过去的隔代照料行为会影响到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但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则不会影响到过去的隔代照料行为,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较小。

第二,内生性也可能来源于遗漏变量问题。影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因素很多,并且存在解释变量未知,或解释变量已知、但难以测量等情况,因此会产生估计偏差。本文选择家庭层面的“孙辈数量”和“16岁以下的孙辈数量”作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对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行检验。“孙辈数量”和“16岁以下的孙辈数量”会直接影响祖辈的隔代照料行为,但不会直接影响到祖辈的养老预期。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对所有回归模型而言,Wald检验的P值均显著,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认为“隔代照料”为内生变量。

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正向影响，如果仅采用 Probit 回归，就会低估隔代照料对城镇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隔代照料对不同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均显著，且对城镇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影响的边际效应大于农村户籍祖辈。

表 3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内生性检验（IV-Probit）

变量	(1)	(2)	(3)	(4)	(5)	(6)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是否照料	0.438*** (0.018)	0.362*** (0.091)	0.336*** (0.034)	—	—	—
照料时间	—	—	—	0.007*** (0.0004)	0.006*** (0.001)	0.005***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观测值	8657	1494	7163	8657	1494	7163
Wald chi2 (1)	98.45	8.75	38.53	102.56	10.35	33.77
P值	0.000	0.003	0.000	0.000	0.001	0.000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第三，内生性问题还可能来源于变量的测量误差。因此，本文利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配偶花多长时间照看孙子女”中“我花多少周照料孙子女”来构建一个新测量指标，作为“是否照料”的代理变量，命名为“有无照料经历”。当隔代照料时间为 0 时，将其赋值为 0；当隔代照料时间大于 0 时，将其赋值为 1。表 4 的估计结果显示，采用代理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与原结果一致，即有无照料经历对城乡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表明，“是否照料”变量中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对本研究的估计结果影响不大。

表 4 改变隔代照料测量方式的估计结果

变量	Probit	Probit	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有无照料经历	0.045*** (0.010)	0.003 (0.021)	0.059*** (0.011)	0.456*** (0.017)	0.433*** (0.079)	0.356*** (0.035)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观测值	8657	1494	7163	8657	1494	7163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本文进一步将照料时间以分类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以分析不同照料强度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选择“无照料经历”作为参照组，将照料时间为 25 周以下、25~52 周和 53 周及以上组作为考察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与无照料经历的祖辈相比，照料强度在 25 周以上均会对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照料强度的增加，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梯度增加趋势；照料强度在 25 周以下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①祖辈提供隔代照料的时间越短，从事“收入性”

工作的时间就越长, 收入的增加无疑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代际赡养预期。②随着照料强度的增加, 祖辈承担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由此导致其代际赡养预期不断提高。分户籍估计结果表明, 照料强度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正向影响, 但对城镇户籍祖辈的影响不显著, 随着照料强度的增加, 其对农村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也呈现出梯度增长趋势; 在 25~52 周和 53 周及以上两组中, 照料强度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要大于整体样本。

表 5 照料强度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变量	整体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无照料经历			
25 周以下	0.005 (0.016)	-0.055 (0.035)	0.016 (0.017)
25~52 周	0.047*** (0.012)	0.018 (0.023)	0.065*** (0.012)
53 周及以上	0.106*** (0.021)	0.010 (0.044)	0.111*** (0.022)
控制变量	Y	Y	Y
观测值	8657	1494	7163

注: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 五、进一步讨论与拓展

### (一) 隔代照料对不同年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 45~54 岁、55~64 岁、65~74 岁、75 岁及以上四组。表 6 中, A 部分和 B 部分分别估计了“是否照料”和“照料时间”对不同年龄段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第一, “是否照料”方面。55~64 岁、65~74 岁、75 岁及以上三组中, “是否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均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加,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呈增加趋势; 45~54 岁年龄组中, “是否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该年龄段的祖辈较年轻, 身体状况和收入状况相对较好, 对未来养老需求的认知不明确, 从而导致其养老预期存在较大偏差。

第二, “照料时间”方面。在 45~54 岁年龄组中, 照料时间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不显著, 而对 55~64 岁、65~74 岁、75 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的影响显著; 照料时间每增加 1%, 祖辈预期依靠子女赡养的概率会分别增加 0.5%、0.6%和 1.1%, 这表明, 年龄越大, 隔代照料时间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影响的边际效应越大。原因在于, ①年轻的祖辈尚具有劳动能力, 他们更倾向于工作, 而不是替子女照顾孩子。②随着年龄增加, 老人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机能急剧下降, 隔代照料意味着更高的健康成本和经济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祖辈付出的隔代照料时间越长, 对子女的赡养预期越高。

表 6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不同年龄比较

变量	45~54 岁		55~64 岁		65~74 岁		75 岁及以上	
A 部分: 是否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是否照料	0.076***	0.118	0.043***	0.387***	0.074***	0.298***	0.051	0.320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0.022)	(0.097)	(0.015)	(0.048)	(0.017)	(0.056)	(0.037)	(0.24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观测值	1723	1723	3582	3582	2472	2472	880	880
B 部分: 照料时间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照料时间	0.001*** (0.0004)	0.002 (0.001)	0.001*** (0.0002)	0.005*** (0.001)	0.001*** (0.0003)	0.006*** (0.001)	0.001* (0.001)	0.011*** (0.00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观测值	1723	1723	3582	3582	2472	2472	880	880

注: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 (二) 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家庭结构濒临瓦解, 家庭内的代际分工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并表现在不同的居住安排上。本文以 70 岁为界进行分组, 考察不同居住安排下,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7。

第一, 无论是否与子女同住,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 隔代照料对其代际赡养预期影响的边际效应高于没有与子女同住的祖辈。原因在于, 与子女同住, 不仅有助于父母照顾孙辈, 缓解子女的生活压力, 而且有助于家庭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使之成为未来子女赡养父母的情感纽带。

第二, 回归结果还进一步显示, 在与子女同住的祖辈中, “是否照料”对高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不显著, 相比之下, “照料时间”对高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照料时间越长, 高龄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越大。

表 7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差异: 不同居住安排比较

变量	同住				不同住			
A 部分: 是否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低龄		高龄		低龄		高龄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是否照料	0.065*** (0.016)	0.346*** (0.067)	0.048 (0.041)	0.412 (0.251)	0.049*** (0.013)	0.272*** (0.062)	0.054** (0.027)	0.228*** (0.082)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观测值	2454	2454	508	508	4386	4386	1309	1309
B 部分: 照料时间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低龄		高龄		低龄		高龄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照料时间	0.001*** (0.0002)	0.004*** (0.001)	0.001* (0.001)	0.009*** (0.002)	0.001*** (0.0002)	0.004***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观测值	2454	2454	508	508	4386	4386	1309	1309
-----	------	------	-----	-----	------	------	------	------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边际效应标准差。

## 六、结论

步入现代社会，自由与理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传统家庭结构走向解体，建立在孝道伦理和熟人社会之上的评价机制很难保证子女赡养父母；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女性就业机会增多，但市场化托幼服务却难以满足需求（陶涛等，2018）。在这种情况下，隔代照料和子女赡养的代际交换行为，不仅能够缓解子女的育儿压力，而且成为老年人获得生活保障的重要途径（许琪，2017）。本文利用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

第一，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隔代照料经历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高于没有隔代照料经历的祖辈；隔代照料时间越长，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就越高。第二，隔代照料对不同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不同，隔代照料对城镇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略高于农村祖辈。第三，隔代照料对 55 岁及以上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正向影响，随着年龄增加，其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阶梯型增长趋势，但是对 55 岁以下祖辈的影响不显著。第四，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隔代照料对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照料时间对高龄且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效应大于其他类型的祖辈。

有学者认为，中国家庭内的代际赡养关系建立在“情感之自然流露”之上，是“血浓于水、家族延续”的自然结果（潘光旦，1993）。但这种理论解释缺乏实证支持，无法对新的家庭代际关系模式给出更有力的解释（宋璐、冯雪，2018）。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年轻人外出就业增多，虽然有传统文化规范的约束，但当祖辈父母面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艰巨的照料任务时，他们仍缺乏足够的动力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服务（Burnette et al., 2013）。本文认为，祖辈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是家庭代际的一种资源交换和再分配行为，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不断瓦解和重构的结果。

家庭往往承载着“微治理”的功能。从表面上看，隔代照料与子女代际赡养只是家庭成员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形式，但本质却是代际的一种资源交换和再分配机制。在养老保险体系不完善、托儿育儿服务不健全的当下，建立起隔代照料和代际赡养的家庭互动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成年子女的生活压力，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而且对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模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①政府在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同时，应当充分尊重和认可老年人的自我价值观念。②在强调隔代照料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同时，应该关注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心理和身体产生的不利影响。③应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

### 参考文献

1. 贝克尔, 1987: 《家庭经济分析》, 彭松建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 陈皆明, 1998: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 3.狄金华、郑丹丹, 2016:《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第1期。
- 4.费孝通, 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5.何圆、王伊攀, 2015:《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 ——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6.怀默霆, 2001:《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 现代化的悖论》,《中国学术》第4期。
- 7.刘文蓉, 2012:《孝道衰落?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2期。
- 8.卢洪友、余锦亮、杜亦譔, 2017:《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分析》,《财经研究》第12期。
- 9.陆杰华、张莉, 2018:《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人口学刊》第2期。
- 10.潘光旦, 1993:《潘光旦文集》(第1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宋璐、冯雪, 2018:《隔代抚养: 以祖父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2.孙鹃娟、张航空, 2013:《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
- 13.陶涛、刘雯莉、孙铭涛, 2018:《代际交换、责任内化还是利他主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人口研究》第5期。
- 14.吴培材, 2018:《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15.吴小英, 2008:《代际关系》, 载李培林、李强、马戎(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254-277页。
- 16.熊跃根, 1998:《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祖辈照顾》,《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17.许琪, 2017:《扶上马再送一程: 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社会》第2期。
- 18.杨菊华, 2018:《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19.张川川、李雅娴、胡志安, 2017:《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预期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经济学(季刊)》第2期。
- 20.张新梅, 1999:《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人口学刊》第1期。
- 21.周晶、韩央迪、Weiyu Mao、Yura Lee、Iris Chi, 2016:《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 22.Bumette, D., J. Sun, and F. Sun, 2013,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Grandparent Care of Children in the U.S. and China", *Ageing International*, 38 (1): 43-57.
- 23.Goode, W. J.,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 24.Ko, P. C., and K. Hank, 2014,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and Korea: Findings from CHARLS and KLoSA",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4): 646-651.
- 25.Logan, J. R., F. Bian, and Y. Bian,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76(3): 851-882.

26.Nishimura, Y., M. Oikawa, and H. Motegi, 2018, “What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Retirement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Global Aging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2(3): 792-847.

27.Rupert, P., and G. Zanella, 2018, “Grand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9(3): 89-103.

28.Kanji, S., 2018, “Grandparent Care: A Key Factor in Mother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UK”,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7(3): 523-542.

29.Silverstein, M., V. Burholt, and G. C. Wenger, 1998, “Parent-child Relations among Very Old Parents in Wal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Tes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2 (4): 387-409.

30.Whyte, M. K., 2004, “Filial Oblig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Paradoxes of Modernization”, in C. Ikels (eds.) *Filial Piet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6-127.

31.Whyte, M. K., 1984, “Sexual Inequality under Socialism: The Chinese Case in Perspective”, in J. L. Watson (eds.)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8-238.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浩毅)

## The Impacts of Grandchild Care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xpect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ARLS Data

Bao Yingying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market forces and population ageing, grandchild care and grandparent support have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division of modern family.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grandchild care on the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y using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ndchild ca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irstly, grandchild care has a slightly lower impact on the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rural grandparents than urban grandparents. Secondly, grandchild car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grandparents aged 55 and over. With the age increase, the marginal effect shows a ladder-like growth trend, but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grandparents aged under 55. Thirdly, grandchild ca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ec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grandparents with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For grandparents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ir expectations of child support is greater than that for grandparents living without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Grandchild Care; Expec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